前 言

—— 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述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然而，尽管彻底的民主革命为现代化扫除了中国大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障碍，却不能扫除中国的贫穷落后、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新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加快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制度变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探索的。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领导人和全国人民 50 年的艰辛探索和奋发图强，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温故而知新，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和展望明天，这是本书的出发点，也是本书欲达到的目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历程的回顾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以 1978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社会变革目标，千方百计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当 1956 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在第二个时期，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过渡。可以说， 50 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就经济体制的演变而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1949 年—1957 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从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建立到 1957 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时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1949 年—1952 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

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在中国大陆全面贯彻实施的三年，党和政府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海关自主、实行“贸易许可证”和“结汇制”，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复时期的三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 1953 年以后大陆迅速平稳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从 1953 年开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同时走上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其结果，一是在经济落后、资金和人材短缺的条件下，为加快工业化步伐，被迫选择了一条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二是为保障上述战略的实施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即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将资源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其消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这就是，一方面这种发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经济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和引发周期性的波动；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经验并借鉴苏联暴露的经济建设教训，曾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因体制弊端还未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总的来说，这七年既是新中国凯歌行进、意气风发、成就巨大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因缺乏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民主革命时期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转到更多地信从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转而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时期。辉煌与误区同在，是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历史的突出特点。

（二）1958年—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从1958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

4339.39 亿元，是“一五”计划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 8.82 倍。从 1958 年到 1978 年，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为：炼钢 2911.3 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新增炼钢能力的 10.34 倍；煤炭开采 36510 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5.73 倍；发电机组容量 4859.5 万千瓦，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19.68 倍；石油开采 10973 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83.64 倍；化肥 1132.53 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122.57 倍；水泥 4614 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17.66 倍；棉纺锭 830 万锭，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4.13 倍；机制糖 234.8 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3.79 倍；自行车 318.6 万辆，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6.37 倍；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 18458 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4.43 倍；新建公路 153316 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 1.84 倍。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除公路增长较慢外，其他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和牺牲消费来维持的。

从就业结构来看：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 年—1957 年的八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 89.4% 下降到 84.6%，下降了近 5 个百分点；而 1958 年—1978 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 1957 年的 84.6% 下降为 1978 年的 82.1%，20 年仅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从就业结构来看，1957 年全国农业劳动者共有 19310 万人，到 1978 年，农业劳动者增加到 29426 万人，而同期农业总产值仅增长 84%，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分缓慢。如果考虑到 1978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比 1957 年下降 4.55 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比 1957 年增长 95.8 倍，农业剩余人口问题更为严重。

人民收入增长很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 年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 1957 年增加 7 元。1978 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 175 元，仅比 1957 年增加 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 34.5%，非农业居民增加 68.6%。人均食品消费情况：1957 年人均粮食 612斤，棉花 5.2斤，油料 13.2 斤，肥猪 0.11 头，猪牛羊肉 12.5 斤，水产品 9.8 斤，到 1978 年，上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仅为粮食 637 斤，棉花 4.5斤，油料 10.9 斤，肥猪 0.17 头，猪牛羊肉 17.9 斤，水产品 9.7 斤，多数增长不大，少数还有所下降。1978 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仅为 4.4 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 8.1 平方米。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胜利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对比同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在此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终于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当时称“生产关系”）到底解决了没有？1957 年的“反右”运动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异议和不同声音压了下去。单一公有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以集权和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为后来 20 年的“左”的错误种下了根源。

人口增长过快，是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从 1958 年—1978 年的 20 年间，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58 年—1961 年，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使人口在 1960 年和 1961 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960 年底比 1959 年底减少

人口 1000 万，1961 年底又比 1960 年底减少 348 万。从 1957 年底到 1961 年底，4 年内全国总人口仅增加 1206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4.63‰，是建国以来最低的阶段。1962 年以后，全国出现了一次空前的生育高潮，1963 年达到顶峰，全国人口出生率高达 43.6‰，当年人口比上年增加 1877 万，这种增长带有补偿性、恢复性的特点。其后又在较长时期内居高不下，直到 1973 年党和政府将人口发展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切实抓紧计划生育工作，才使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到 1978 年的 13.53‰。到 1978 年底，全国总人口已由 1957 年底的 64653 万人增加到 96259 万人。20 年里人口增加了近 50%。

（三）1979 年－1998 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79 年—1998 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是从前 28 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上起步发展的，虽然前进的起点比较高，但继续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束缚，又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因此，1984 年以前，我国经济以 1978 年的“三中全会”为转折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纠正和清算了前 20 年“左”的错误，根据我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制订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与此同时，还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1984 年“六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成为建国以来效益

最好的五年计划。受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鼓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但追求提前翻番的传统思想和实际存在的新旧体制磨擦，使经济在繁荣中出现过热。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以及原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都使整个社会处于躁动和不安的状态中。在这种形势下，是稳定经济为主还是继续加快改革，意见不一。对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分歧也很大。于是，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 年一1987 年的“软着陆”，1988 年价格“闯关”和 1989 年—1991 年治理整顿的曲折。但是，这种曲折，对于 80 年代的发展来说，毕竟是瑕不掩瑜，是前进中的问题，高速发展下的副作用。

经过 80 年代的迅速发展，到 90 年代初，我国已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经过治理整顿，社会供求比较平衡，客观上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制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方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正确决策，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 1992 年到 1998 年的七年间，由于及时、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使“八五”计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五年计划。同时，这八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到 1997 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提前实现了原定于 2000 年才实现的翻两番任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1998 年，

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8% 的高速度，并且适时采取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内需的措施，为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可以说，经过 20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党和政府长期追求的“高增长、低通胀”目标，国民经济已经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回顾新中国 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叫人痛惜的失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教训。

（一）社会主义观念和制度必须与时俱进

由于我国走上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与苏联不同，苏联是由无产阶级革命退到新经济政策，然后再进到社会主义的。我国则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进到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曾经经历过的理论比较成熟、实践也比较成功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已经被历史证明是符合当时国情并卓有成效的。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党放弃了“七大”上提出的必须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观点，是受到党内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的影响；由此发生的急于消灭私营经济和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脱离了中国国情。

从历史来看，这是我国 50 年来所经历的三个前后相联系的历史阶段。从理论上来看，三者之间又具有“否定之否定”

的扬弃与发展关系。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什么角度来理解它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站在今天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角度来看待三者的关系，而不能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角度，也不能站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角度。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1952 年底的这段时间，中国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这个判断，史学界几乎没有疑义。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进一步说，是如何评价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个问题的引申，即产生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探讨，因为除了不可变更的历史发展顺序（包括不同的历史时点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以及中间经过了一个 20 余年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外，二者在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以及发展方向方面都非常接近，以致使不少人往往忽略了其差异。

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准确恰当地评价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以及 1953 年—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对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评价，应从理论和历史两个角度结合去研究，正如人有两只眼睛才能立体地看待外界景物。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完善的角度考察，亦即中国共产党探索和解决中国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角度考察。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21 年—1949 年，经过 28 年的探索，形成

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即形成于这个时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革命，即推翻三座大山，扫除中国发展的障碍，因此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上，即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和政策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至于建国初期，由于党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恢复经济、巩固政权上，因此，顺理成章地贯彻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是最明智的选择。

1949 年至今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党在理论上的探索主线，始终是寻找一条加速中国发展和人民共同受益的道路。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社会发展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像建党初期怎样搞民主革命一样，是个比较陌生的问题。因为 1949 年以前的根据地经济毕竟只是一种战时的、农村的、区域的经济，并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支援战争，而不是发展问题。1949 年—1952 年，经济上的主要任务是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是经济恢复问题，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操作性探索才刚开始。而 50 年代前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实现工业化的迫切心情，与苏联二三十年代又很相近，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令人景仰（1956 年苏共二十大才揭开了盖子，发现其工业化也有不少弊病），因此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就在所难免了。从 1953 年到 1978 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又试图改革其弊病的前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正确的改革思路和错误的改革思路并存交织在一起，但“左”倾改革思路占了上风，直至演变成“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的改革思路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建国以来党在探索方面的丰富经验教训，既是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依据，也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这个理论提供了参照。

由于新民主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完成各自历史任务）艰辛探索的科学结晶，因此二者之间不仅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前后相承的发展关系，甚至两个理论都是在一代人身上形成的，创立和参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导人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主要参与者。从这个角度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的科学结晶。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的科学结晶，其中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自然要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体现出来。是否可以这样说，新民主主义是 40 年代末党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 90 年代党对鸦片战争以来 150 年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后者既包含前者，又比前者更丰富、更深刻，因为后者经过了对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扬弃并吸取了战后 40 余年中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其次从历史进化的角度考察。时间是不可停止、不可逆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目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像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历史阶段。前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最终成果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现代化扫除了障碍。因此它所代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民主革命的产物，它之所以不同于早期独立国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就

在于它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既反封建、又反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主革命。在当时资本主义弊病丛生，而这些国家又缺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只能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共同起作用的混合经济体制。而战后经济的发展则不断证明，无论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还是贫富差别很大、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 都不如这种模式好。实际上，战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改革，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都是趋于计划管理与市场调控并重，重视社会二次分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大概就是出于此，但是在当时，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把它作为过渡的经济形态，而不是成熟的经济形态。这种历史性的失之交臂，也进一步说明新民主主义只是民主革命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

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已成为历史的经济形态和理论。从 1949 年—1952 年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经过“四过”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经过缓慢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采取限制而不是消灭私营经济的办法，中国恐怕都要走到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因为中国的国情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否这样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正确思路的发展，并已经形成为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新中国经济 50 年来发展选择的结果，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国际环境、党和人民的心态

来说，都与建国初期大不一样了。

新民主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两个历史阶段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后者与前者的相近之处尽管很多，也不是一种体制上的“回归”，而是包含，是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即后人的体制总是要剔除前人不正确或过时的东西，包含前人正确的东西，这才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巨大作用来看，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存在和发展；抱残守缺，囿于成见，只能葬送社会主义。

（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把握历史契机的关键

纵观建国以来 50 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就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来说，曾经失去过几次历史契机，也抓住了几次历史契机。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曾经有过三次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

第一次是 1956 年中共“八大”以后。“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苏联教训和自己的经验总结，提出了旨在弥补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和体制变革设想，使我国再次面临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受“反右”运动和“反‘反冒进’”的影响，却走上“大跃进”的歧途。

第二次是 1961 年至 1963 年。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的改革方式，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和邓子恢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使中国面临着一个经济改革的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

的担忧和对“单干风”的严厉批判，直至发动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革”，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契机。

第三次是 1974 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进行“整顿”。此时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城市就业困难，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党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文革”和极“左”的那套思想和体制已经失望，迫切希望结束“文革”，发展经济。邓小平的复出和“整顿”又给了中国改革和发展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革”，以批判“右倾翻案风”和罢免邓小平领导职务导致了这次历史契机的丧失。

第四次历史契机是 1978 年。当时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不满，对经济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满，要求改革。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抓住这次历史契机，终于将中国引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第五次是 1992 年。由于受治理整顿、“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因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束缚而彷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开迷雾，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果断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宏伟目标，加快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

综上所述，三次经济发展和改革历史契机的丧失，其主要原因都是受到姓“社”姓“资”问题的干扰，都是将实现和保护“社会主义”制度放在第一位，结果陷入生产关系处于第一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处于第二位的陷阱，甚至被

“四人帮”所利用歪曲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耽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完善。与此相反，1978 年和 1992 年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和第三代领导人能够抓住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则是将三个“有利于”放在第一位，并以此来判断改革和发展。如果以生产关系为第一标准，那么，由于对于生产关系的理解总是受当时认识的局限，就很难准确评价是非。

（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建国以来的 50 年，如果以 1978 年为界，前 29 年所致力于建立和巩固的经济体制恰恰是后 20 多年致力于改革的体制。因此，无论是研究现实经济问题，还是研究历史问题，都无法绕开对改革开放前经济体制的评价，而且人们实际上心中都有一个评价。

对于改革开放前经济体制的评价，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同与当时我国国情的关系问题；二是它的绩效如何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种方法是从理论上分析，即以改革开放前夕的经济体制作为对象进行分析，排除对其不同历史阶段差异的考察，这种抽象的方法对于认识改革的起点、任务，不失为一种简捷方法，并且为许多人采用。另一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通过系统考察原有经济体制产生、演变的历史及其历史条件，寻找出这种经济体制形成演变的原因以及作用的变化。

对于第一种方法，如果以 1978 年以前“文革”十年的经济体制为对象，可以说，这种体制既无效率可言，也无公平可言。

从宏观计划管理来看，从 1966 年开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 1976 年开始实施的第五个五年计划，都没有正式形成计划，计划管理的水平相当低，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管理性质的、粗放的、随意性很大的计划经济。

从微观经济运行来看，农村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城市批判“奖金挂帅”、“利润第一”，将生产和分配中的“大锅饭”发展到顶点，再加上政治动乱的干扰破坏，效益非常低。这种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严重脱离了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教育落后的国情。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文革”十年也将不公平发展到极点。一是严厉限制农民的流动和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农民不仅丧失了迁徙流动的权利，也丧失了生产自主权和收益支配权；二是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其社会地位受到空前的贬低；三是城市的一大批知识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剥夺了其选择就业和居住地的权利。

至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由选择程度的增加，则基本没有改善，甚至有所恶化。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是 1978 年以前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压制和对人民的束缚，才使改革开放初期爆发出巨大的“纠正效应”，也使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为发展和改革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如果以第二种方法来分析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就会看到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其体制和政策有差异，而且其作用也有较大差异。

对于 50 年代前半期来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以消除旧中国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正如邓小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